

中国人福利态度变迁趋势研究（2001—2018）

——基于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的实证分析

吴玉玲

[摘要] 论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01、2007、2012 与 2018 年中国样本调查数据，利用分层 APC 随机效应模型（HAPC-CCREM），对中国人福利态度的年龄、时期、世代变迁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近 20 年，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略有提升；年龄与世代趋势较为显著，相比于年轻人，中青年与老年人更倾向于国家保障个体生活，尤其新中国建设代的 1950 世代组与一孩政策代的 1985 世代组对国家福利保障责任的期待最高；此外，宏观层面，经济发展对福利态度的影响结果并不支持政府保护假设；微观层面，社会阶层等个体特征对福利态度的影响结果均支持个人自利假设。研究建议，国家应在养老、育儿、就业等方面更为积极地进行政策体系建设，逐步减少对福利依赖的过分担忧，积极发展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 福利态度；变迁趋势；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

一、引言

公众福利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基本观念，也是政府提供福利的基本依据，因此被认为是政策的肌肤，社会的晴雨表。^①20 世纪 70 年代福利国家遭遇合法性危机，福利态度研究遂在西方国家兴起。当前，国际学界对福利态度的研究以国别 / 体制比较为主，如对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不同福利体制间公众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等，以期探讨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之间的异同之处。

在西方社会，福利保障被认为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福利供给也被认为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与义务。^②而在东亚社会，由于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庞大与紧密的家庭 / 族网络是个体福祉的主要保障，因此，个体的国家福利责任意识较为薄弱。^③我国儒家文化悠久，家庭为本的福利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家庭、宗族甚至社区均在福利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转型、人口转变与家庭模式的演变，家庭、宗族与社区逐渐失去了福利供给的

[作者简介] 吴玉玲，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阶层与观念、流动人口等。

① 臧其胜：《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公共行政评论》2016 年第 4 期。

② 钱宁：《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③ 朴炳铉、高春兰：《儒家文化与东亚社会福利模式》，《长白学刊》2007 年第 2 期。

主体性作用,人们对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期待日益强烈。

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自此,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进入密集出台时期,也逐渐形成“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理念。我国对困境群体给予福利支持的价值观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的个人责任论开始向社会责任论的方向转变。^①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重点探讨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迁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变迁趋势的研究,主要分为年龄趋势、时期趋势、世代趋势。^②其中时期趋势与世代趋势分别指向社会不同发展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观念与态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会主要探讨,在我国不同发展时期,民众福利态度呈现怎样的特征?不同世代群体的福利态度会展现何种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角色转换,个体福利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此外,教育、工作、阶层等个体特征对个体福利态度的影响也是本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尝试通过时间维度对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迁趋势进行研究,以期为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完善福利保障制度提供有效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福利态度是一个较为宽泛和灵活的概念,在不同研究中由于测量指标不同而有所差异。态度一般指就特定的态度对象而言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做出回应的一种倾向。^③因此,福利态度可以是人们如何看待政府在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供给上的政策,亦或公民以支持或是不支持的方式对政府承担不同层面的福利责任做出回应,即对政府福利提供的一种情感认同度。^④本文将采用后一种对福利态度的界定方式,即人们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政府对个人生活的保障责任。下面本文就公众福利态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进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并提出具体研究问题与假设。

(一) 福利态度的年龄效应

年龄与态度或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出基于年龄的生理特征,更反映了年龄所揭示的生命周期效应。^⑤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从出生到成熟会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伴随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人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⑥因此,基于年龄增长,人们在经历角色转换的同时也伴随着期待的转变,从而带来观念或态度上的演变。在福利态度研究中,个人自利假设(Self-Interest Hypothesis)指出,个体的人口学

① 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特征与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学海》2019年第3期。

② 吴晓刚、李晓光:《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的变迁趋势——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动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③ Trude Sundberg, "Attitudes to the Welfare State: A Systematic Review Approach to the Example of Ethnically Diverse Welfare Stat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4, 19(1).

④ 杨琨、袁迎春:《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3期。

⑤ Lawrence Kohlberg,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avid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9.

⑥ Daniel. J. Levinson,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New York, Knopf, 1978, p.71.

特征与其福利态度存在直接关系,那些易于遭受危机的个体更倾向于支持国家福利供给,反之,优势个体会较少关心政府的再分配政策。^①年龄是影响个体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伴随个体老龄化,其遭受风险的概率增加,因而对国家的福利期待亦会趋强。布莱克山等人利用欧亚地区24国数据分析了公众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发现个体年龄越大越支持国家为病老者与失业者提供福利。^②闫金山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与2015年数据分析了我国民众对政府济贫的态度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愈发支持政府缩减收入差距与消除贫困。^③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年龄对福利态度的负向影响。一项对加拿大民众的福利态度研究发现,相比于老年人,年轻人更认同国家保障个体体面生活的福利责任。^④黄叶青等人利用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欧洲四国数据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人们对政府在缩减收入差距上的支持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⑤对于年轻人为何更支持国家福利供给,学者认为,由于年轻人正处于劳动力市场中,更能体会到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年轻人更可能认同个体权利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不是纯粹私利,因此更支持制度化团结。^⑥

通过对上述两方面文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年龄与福利态度呈负相关关系的研究其数据多采自欧洲与北美国家。在这些国家,后物质主义观念与个人权利意识更为流行,福利保障制度也更为完善,由此或许会抵消部分年龄效应。相比而言,我国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公众面临的现实压力较大,特别是中青年与老年群体。前者既面临赡养父母与抚育子女的双重压力,也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后者的养老需求更为迫切,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对政府提供养老保障的期待更高。^⑦

由此,笔者提出针对年龄效应的假设一与具体研究问题:我国民众福利态度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强化。如否,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在不同年龄阶段将会呈现怎样的特征?

(二) 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反映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福利态度的变化趋势。关于公众福利态度是否会随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强化或弱化,主要存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影响与经济发展影响两个方面的理论假设。

根据现代化理论,工业化过程不仅会推动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不断满足并催生人们的日常需求,也会促使人们不断调整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工业化必将引起社会的、

① Mads Meier Jaeger, "What Makes People Support Public Responsibility for Welfare Provision: Self-Interest or Political Ideology?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Acta Sociologica*, 2006, 49(3).

② Morten Blekesaune, Jill Quadagno,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tat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4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19(5).

③ 闫金山:《济贫态度的阶层差异与变迁——基于CGSS2005/2015的实证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④ Mads Meier Jaeger, "What Makes People Support Public Responsibility for Welfare Provision: Self-Interest or Political Ideology?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Acta Sociologica*, 2006, 49(3).

⑤ 黄叶青等:《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

⑥ Hans-Jürgen Andreß, Thorsten Heien, "Four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17(4).

⑦ 陶涛、刘雯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2019年第4期。

文化的、观念的转变。^①英格尔哈特等人基于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发现,当社会变得富足之后,人们由原来对物质的、生理的或安全的关心,逐步转向对自我实现、社区团结等方面的关注,体现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现代化,自我表达、独立、个体权利等后物质主义观念渐趋流行。^③同时,由于医疗卫生问题、贫富分化等日益严重,人们对政府进行福利干预与保障的需求与期待不断提升。因此,进入21世纪,国家日益重视社会建设。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消除绝对贫困的全面胜利,在我国政府积极为困境人群提供福利保障的过程中,社会问题的个人责任论逐步向社会责任论的方向转变,并逐渐形成国家福利责任观念。^④因此,理论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众对国家福利供给的支持态度将会逐渐强化。

但是政府保护假设(Governmental Protection Hypothesis)则提出了另一主张。该假设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工作机会较多,人们通常相信能通过自我奋斗保障个体福祉,因此认为政府在福利保障中发挥有限作用;而在经济困难时期,当个体的发展低于预期时,人们倾向于支持政府在福利供给中发挥更大作用。^⑤布莱克山利用1990—2000年间涵盖39个国家的三期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以就业率为指标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发现经济繁荣确会弱化人们的福利态度。^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发展。在2000—2018年之间,我国GDP总量增加了近9倍,人均GDP增加了8倍。依据政府保护假设,在这段时期,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应逐渐弱化。但正如上所述,我国目前依然处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国家积极进行社会保障建设,但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依然以补缺为主,且老龄化加速、儿童照顾危机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以自我实现、个体权利为代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逐渐流行。

基于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与具体研究问题:近20年,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将趋于强化;但经济发展会弱化人们的福利态度。如否,我国公众的福利态度将会呈现怎样的时期特征?

(三) 世代效应

世代效应体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观念与态度的影响。世代是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⑦曼海姆的“社会代”(Social Cohort 或 Social Generation)理论指出,在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将会深刻影响着这一群体,并使

① Ronald Inglehart,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1).

② Ronald Inglehart, Paul B. Abrams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Value Chan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2).

③ Jiaming Sun, Xun Wang,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tions in China: A Study in Shanghai,"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0, 13(1).

④ 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特征与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学海》2019年第3期。

⑤ Ursula Dallinger, "Public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What Explain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0, 20(4); Morten Blekesaun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Welfare Polic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23(3).

⑥ Morten Blekesaun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Welfare Polic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23(3).

⑦ 李春玲:《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

其形成区别于前辈群体的价值观念、态度及行为模式,构成属于这一群体的共同身份与独特的社会性格,这一同龄群体即被称为一个社会代。^① 生命历程理论也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在历史的时间和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并强调要将个人置于一定的历史情景中,并由此出发去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世代群体的影响。^② 依据上述理论,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着同龄群体的人生体验,并进而影响着这一世代群体的价值观,即所谓世代效应。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重大历史事件,如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孩政策等。很多研究表明,中国近几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事件与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将成长于其中的群体勾划出不同的世代,而不同世代展现出了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一孩政策下的年轻世代更注重个体权利与自主,更具有创新精神,对未来也更乐观等。^③ 由此,笔者认为,不同世代群体因经历了不同重大社会事件,可能会对国家福利责任持不同的态度。

根据社会化理论,发生在个体青少年时期的重大事件影响最大,但是成人时期的福利待遇对个体的福利态度影响也至关重要。比如出生于1940年以前(包括1940年)的“旧中国”一代,他们的成长历程充满战争与贫困,但是成年后享受到了新中国政府提供的全面福利。出生于1941—1950年的新中国建设一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因此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的工作、生活等均得到了国家保障。但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文革和国企改革等事件与政策的影响。出生于1951—1965年的文革一代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他们在就业、居住等方面依然享受到了集体福利政策,但他们在中年时代也经历了下岗浪潮的冲击。出生于1966—1980年的改革一代则在青少年时期初步感受到经济改革对原有单位福利制度的冲击与影响,但同时,他们也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带来的机会红利。而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世代群体多为独生子女,他们处于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但错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福利,因此他们主要依靠自我奋斗与家庭支持以实现财富积累与向上流动。通过比较,以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世代成长环境较为富足,更有可能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也更可能支持个体权利与制度性团结。

基于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与具体研究问题: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世代效应将总体表现为愈年轻的世代愈支持国家福利供给。如否,不同世代群体将会呈现怎样差异化的福利态度?

(四) 其他个体影响因素

根据个人自利假设,男性、高社会阶层、已就业的个体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安全感,更可能强调自我保障;而女性、低阶层人群、无业者、病弱者等弱势群体遭受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保障福利供给。^④ 另外,教育程度也被认为是影响个体福利态度的重要

①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Karl Mannheim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② [美] G.H. 埃尔德著,田禾、马春华译:《大萧条的孩子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39-448页。

③ Kineta H. Hung, et al., "A Soci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Generation Cohort in China with a Comparison with American Consum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5); Xiang Yi, et al.,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 Career Implications,"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10, 15(6).

④ Morten Blekesaune, Jill Quadagno,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tat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4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19(5); Mads Meier Jaeger, "United but Divided: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Level and Variance in Public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25(6).

因素,一般来讲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认同公民权利,因此更可能对政府福利供给持支持态度。^①此外,埃斯平-安德森认为,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是因为福利国家在社会平等等方面的价值观念不同。^②那些认同社会平等观念的人,更倾向于对福利政策的社会后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认同经济个人主义的个体则认为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因此其福利态度较弱。^③由此,本研究在探讨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年龄、时期与世代趋势的同时,也将关注性别、教育、工作、社会阶层、健康状况、经济个人主义理念等个人特征因素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一) 数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中国样本2001年、2007年、2012年与2018年的数据对我国民众福利态度变迁趋势进行研究。WVS由当代著名政治科学家英格尔哈特创立,主要用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变迁。自2001年起,WVS在中国调查中加入有关福利态度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2001年至2018年的四期数据。因四期调查数据采用相同的抽样原则与调查问题,所以我们可借此数据对国人福利态度的变迁趋势进行跨期与世代研究。WVS中国数据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样本数分别为1000、1991、2300和3036。剔除缺失值后,最终样本数分别为758、1101、1800和2691,样本总量为6350,其中男性人数为3020(47.56%),女性人数为3330(52.44%),平均年龄为43岁。

(二) 变量

WVS问卷设计了相关题目测量被访者的福利态度,在“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与“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两个看法之间,被访者要求用分值表明其态度,从1到10,分值越大表示越认同个人责任。因为本研究的福利态度主要指个体对国家福利责任的看法,所以笔者对此进行了逆向处理,以10分表示完全同意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即分值越大,表示个体越支持国家福利责任。

年龄、时期与世代是本研究的三个趋势变量。其中年龄效应采用被访者年龄与年龄平方进行检测。时期变量由WVS四期数据采集年份构成,包括2001年、2007年、2012年与2018年。世代在出生年份的基础上,以相隔5年为一组,从1940世代组(出生于1940年及以前)、1945世代组(出生于1941—1945年),直到2000世代组(出生于1996—2000年),共计13个世代组(请见表1)。

① Yeheskel Hasenfeld, Jane A. Rafferty,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1989, 67(4).

② 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1990, p. 199.

③ Wim van Oorschot, et al., "Popular Perceptions of Welfare State Consequences: A Multilevel,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25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2, 22(2).

表1 时期与世代的样本分布

世代	世代组	时期				
		2001	2007	2012	2018	总计
旧中国代	1940	32	45	35	0	112
新中国建设代	1945	34	72	89	0	195
	1950	73	94	116	116	399
文革代	1955	94	114	155	241	604
	1960	109	105	125	210	549
	1965	125	148	202	249	724
改革开放代	1970	122	183	206	331	842
	1975	100	125	213	328	766
	1980	52	91	193	283	619
一孩政策代	1985	17	71	183	253	524
	1990	0	53	196	289	538
	1995	0	0	87	172	259
	2000	0	0	0	219	219
总计		758	1101	1800	2691	6350

个体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等相关因素被纳入模型中。其中变量“经济个人主义观念”由问卷中的一道具体题目进行测量。该题目要求被访者对“收入是否应该尽可能均等还是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个人工作”给出自己的看法。从1到10，分值越大越同意应该加大收入差距，即其经济个人主义观念越强。所有变量的测量与描述统计请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编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福利态度	1—10，分值越大越支持国家福利责任	5.84	2.88	1	10
第一层自变量					
年龄	被访者在调查当年的年龄	43.24	13.87	18	75
性别	女性 =1，男性 =0	0.52	0.50	0	1
婚姻	已婚 =1，未婚 / 离异 / 丧偶 =0	0.84	0.37	0	1
子女数量	所拥有的子女数量	1.50	1.04	0	7
教育程度	1—3 表示教育程度从无或小学程度、中学程度到大学及以上程度	1.87	0.67	1	3
工作状况	有工作 =1，无工作 =0	0.73	0.44	0	1
社会阶层	1—4 表示个体自认为处于社会低阶层、工人阶层、中产阶层到高阶层	2.34	0.82	1	4
健康自评	1—4，1 为不好，4 为很好	2.84	0.92	1	4
经济个人主义观念	1—10，1 为最低，10 为最高	5.62	2.89	1	10

变量	编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二层自变量					
时期	调查年份			2001	2018
经济发展	人均 GDP（取自然对数）	10.51	0.67	9.07	11.10
世代	每五年一个世代组			1940	2000

（三）分析模型

年龄 - 时期 - 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 APC）是用于趋势研究的主要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人口学与社会学。但是 APC 模型常面临年龄、时期与世代的共线性问题，为此很多学者尝试用不同方法解决此问题。分层 APC 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 HAPC-CCREM）将年龄与时期、世代分置于两个层次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共线性问题。^① 首先，模型将年龄置于第一层次，将其作为个体变量，以估计其固定效应；其后，时期与世代被置于高阶层面作为宏观的随机因素，对个体层面的截距产生影响。据此，本研究中模型第一层为：

$$Y_{ijk} = \beta_{0jk} + \beta_1 \text{Age} + \beta_2 \text{Age}^2 + \beta_3 \text{Sex} + \beta_4 \text{Marriage} + \beta_5 \text{Children} + \beta_6 \text{Education} + \beta_7 \text{Employment} + \beta_8 \text{Class} + \beta_9 \text{Health} + \beta_{10} \text{Individualism} + e_{ijk}, e_{ijk} \sim N(0, \delta^2) \quad (1)$$

第二层为：

$$\beta_{0jk} = \gamma_0 + \gamma_1 \text{GDP} + \mu_{0j} + v_{0k}, \mu_{0j} \sim N(0, \epsilon_u), v_{0k} \sim N(0, \epsilon_v) \quad (2)$$

综合表达式：

$$Y_{ijk} = \gamma_0 + \gamma_1 \text{GDP} + \beta_1 \text{Age} + \beta_2 \text{Age}^2 + \beta_3 \text{Sex} + \beta_4 \text{Marriage} + \beta_5 \text{Children} + \beta_6 \text{Education} + \beta_7 \text{Employment} + \beta_8 \text{Class} + \beta_9 \text{Health} + \beta_{10} \text{Individualism} + \mu_{0j} + v_{0k} + e_{ijk}, \quad (3)$$

其中， $i=1, 2, \dots, n_{jk}$ ，代表在世代组 j 和时期 k 中的个体； $j=1, \dots, 13$ ，代表世代组； $k=1, \dots, 4$ ，代表时期。在该模型中，处于世代组 j ，且在 k 年被访问的个体 i 的福利态度即为 Y_{ijk} 。在 HAPC-CCREM 模型中， β_{0jk} 代表截距，即处在世代组 j 和被测年份 k 中所有个体福利态度的均值。 $\beta_1, \dots, \beta_{10}$ 为第一层固定效应的系数； e_{ijk} 为残差，即个体层面模型中无法解释的部分，被设定为均值为 0，方差为 δ^2 的正态分布； γ_0 为所有个体福利态度在各个时期和世代组的平均分； γ_1 为时期内的 GDP 固定效应系数； μ_{0j} 是世代组 j 作用在截距 β_{0jk} 上的随机效应，呈现均值为 0，方差为 ϵ_u 的正态分布； v_{0k} 为时期 k 作用在截距 β_{0jk} 上的随机效应，呈现均值为 0，方差为 ϵ_v 的正态分布。

此外，由于本研究中的时期数为 4 个，世代组数量为 13 个，因此二级变量数不大于 30，所以采用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方法（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REML）。^② 拟合统计量 AIC 越小表示模型估计越好。本研究采用 SAS 软件做统计分析，并使用 EXCEL 做图表处理。

① Yang Ya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2); Yang Yang, Kenneth C. L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CRC Press, 2013, p. 191.

② Yang Yang, Kenneth C. L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CRC Press, 2013, p. 197.

四、研究结果

由表3所示,笔者建立了三个模型。模型一仅考虑个体层面的变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之上加入世代与时期变量,模型三加入不同时期人均GDP变量以检验政府保护假设。根据模型拟合效果,模型一与模型三的拟合效果均不如模型二,且在模型三中,人均GDP对个体福利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保护假设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依据模型拟合效果,下文对模型结果的讨论以模型二的结果为准。同时,为了更直观的展示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笔者在表3的基础上绘制了福利态度的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图(请见图1、图2与图3)。

除性别与婚姻外,其他个体特征均对个体的福利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子女数量越多、社会阶层越高、个体健康状况越好、个体的经济个人主义观念越强,其福利态度越弱。同时,就业者相比无业者的福利态度也较弱。这些结果均支持个人自利假设。教育程度则与福利态度呈正相关,表明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更可能认同公民的福利权利。

表3 分层APC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固定效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个人层面						
截距	7.22***	0.42	6.80***	0.48	5.74#	1.79
年龄	0.03#	0.02	0.05*	0.02	0.05*	0.02
年龄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性别	0.04	0.07	0.04	0.07	0.04	0.07
婚姻	0.14	0.11	0.11	0.11	0.11	0.12
子女个数	-0.10*	0.04	-0.10*	0.04	-0.10*	0.04
教育程度	0.11#	0.06	0.11#	0.06	0.11#	0.06
工作状况	-0.16#	0.09	-0.20*	0.09	-0.20*	0.09
社会阶层	-0.11*	0.04	-0.11*	0.04	-0.11*	0.04
健康自评	-0.13***	0.04	-0.14***	0.04	-0.14***	0.04
经济个人主义观念	-0.31***	0.01	-0.31***	0.01	-0.32**	0.01
时期层面						
人均GDP					0.10	0.17
随机效应						
世代						
1940			-0.03	0.14	-0.03	0.14
1945			-0.06	0.13	-0.05	0.13
1950			0.20#	0.12	0.21#	0.12
1955			0.04	0.10	0.04	0.10
1960			-0.03	0.10	-0.02	0.10
1965			-0.14	0.10	-0.14	0.10
1970			-0.15	0.10	-0.15	0.10

1975			0.03	0.10	0.02	0.10
1980			- 0.06	0.10	- 0.07	0.10
1985			0.20#	0.11	0.19#	0.11
1990			0.12	0.11	0.11	0.11
1995			- 0.05	0.12	- 0.06	0.12
2000			- 0.06	0.13	- 0.07	0.13
时期						
2001			- 0.22#	0.13	- 0.20#	0.12
2007			0.13	0.12	0.16	0.14
2012			0.19	0.12	0.16	0.15
2018			- 0.10	0.12	- 0.19	0.19
协方差参数						
世代			0.02#	0.02	0.02#	0.02
时期			0.04	0.04	0.06	0.06
个体	7.34***	0.13	7.30***	0.13	7.30***	0.13
拟合统计量 AIC	30736.3		30716.9		30718.4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关于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根据模型结果，个体福利态度的年龄与世代效应更为显著。首先，个体的年龄效应略呈倒 J 型，即个体年龄越大越支持国家为个体提供福利保障，该效应在 60—70 岁之间达到峰值，之后人们的福利态度轻微弱化，但依然高于年轻人。因此，相对于年轻人，中老年更支持国家福利供给责任。这一发现与笔者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就时期效应来讲，人们的福利态度在 2001 年显著低于其他年份，在 2012 年达到峰值，并在 2018 年略有下滑，因此总体来讲，民众福利态度的时期变化呈小幅强化趋势。世代效应并没有验证越年轻世代越支持国家福利责任这样线性发展的假设，而呈现出较明显的波浪式变化，并出现了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出现在新中国建设代的 1950 世代组，第二个峰值出现在一孩政策代的 1985 世代组。波浪式的世代效应体现出各世代组的福利态度受到了不同世代群体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与生活经历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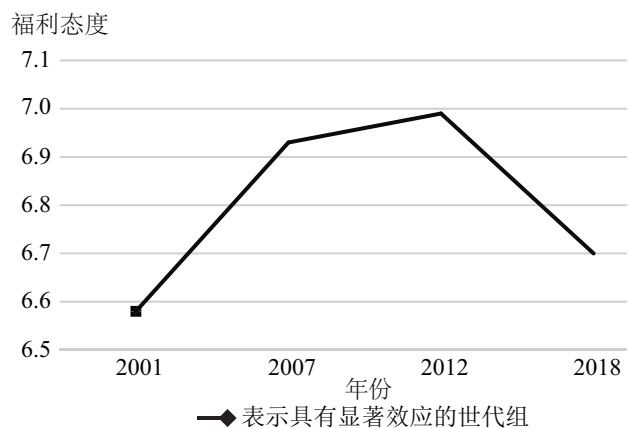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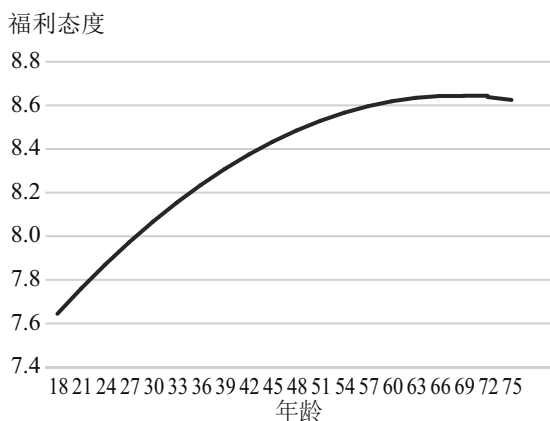


图 1 福利态度的年龄效应（18 岁—75 岁） 图 2 福利态度的时期效应（2001 年—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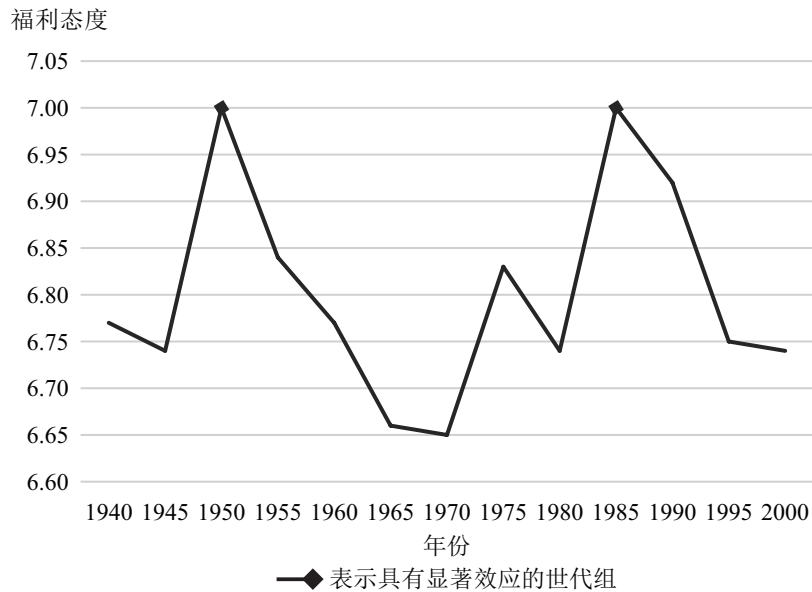


图3 福利态度的世代效应 (1940 世代组—2000 世代组)

五、讨论与结论

通过利用 WVS 中国样本数据, 本文对 2000 年以来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年龄趋势、时期趋势与世代趋势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影响福利态度的个体特征因素。就影响因素来讲, 微观层面, 社会阶层等个体特征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均支持个人自利假设; 宏观层面, 经济发展并没有弱化国人的福利态度。在趋势效应方面, 根据模型结果, 我国民众的福利态度虽在最近几年轻微弱化, 但总体呈现出提升趋势; 相比于年轻人, 中青年与年长者更支持国家保障个体福利; 其中, 1950 世代组与 1985 世代组对国家福利供给责任的期待最高。

政府保护假设认为, 在经济繁荣时期, 人们对依靠自我保障福祉较为自信, 因此会弱化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期待, 但是本研究发现该假设在当前中国情景下并不成立。在 2000—2018 年之间, 我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 但经济增长并没有弱化民众对国家福利供给的期待。笔者认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 我国福利保障基础薄弱。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长期秉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 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建设长期处于弱势与被忽略的地位。尽管进入 21 世纪, 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积极建设, 但是补缺性的福利体系并不能有效应对与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 比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与儿童照顾赤字等。面对养老抚幼的现实压力, 公众亟待国家积极履行福利责任。其次, 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影响, 追求个体自我实现、享受基本福利的社会权利理念等逐渐强化。因此, 在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 民众福利态度整体趋于稳定并略有强化。

在时期效应方面, 研究发现我国民众福利态度在 2012 年达到峰值, 在 2018 年则稍有弱化。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特别强调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017 年党的十九大后, 党中央更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一时期国家积极进行社会建设,民生福祉取得了快速发展。该发现表明,国家在民生事业上的积极投入并没有强化民众对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期待与依赖。该发现也与既有文献发现基本一致,表明完善的福利保障并不必然引起人们过分的福利期待。^①

具体到世代效应,本研究发现,1950与1985世代组对国家福利责任的期待最为强烈。根据世代理论,不同世代群体所展现出的差异化观念与态度主要源于其人生关键阶段所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影响着同龄群体的人生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对1950世代组来讲,一方面他们正值老年,养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在他们青年与中年时期分别经历了文革与下岗失业浪潮的影响,这一群体的职业路径充满曲折,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积累。因此相对于其他老年世代组群体,他们的养老压力与困境可能更为突出,福利需求与期待也就更大。

1985世代组则面临自身流动、养育子女与赡养父母等多重压力。这一群体在初入社会之时正值改革持续深化之时,集体福利制度被抛却,因此错过了就业分配、福利分房等集体福利政策;同时,在市场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机会红利来临时,他们尚未完成经济积累,因此未能抓住市场的机会红利完成固定资产配置。因此,在以资产(住房与收入)决定阶层认同的时代,^②他们对向上流动压力的感知更明显。此外,这一群体也面临着子女照顾与教育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儿童照顾政策明显弱化,同时,教育市场化以及影子教育升温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日益激烈。子女照顾与教育成为亲职压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一对夫妻通常面临赡养四位老人的现实压力。由此,在多重压力下,1985世代组对国家福利责任的期待更为强烈。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根据民众对国家福利责任的期待日益提升的趋势,国家应积极发展与完善福利政策与公共服务。近20年,我国政府在针对老、弱、病、残、幼等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补缺性的福利建设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新时期,国家应逐步弱化对福利依赖的担忧,逐渐优化福利供给中的资源配置与福利内容,积极推进普惠性福利体系建设。其次,针对老年与中青年群体较高的福利期待,国家应重点推进相关公共服务与保障政策建设。针对老年群体,国家应积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与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护理险等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针对中青年群体,国家要继续优化就业政策与相关劳动保障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同时,进一步发展完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并配合双减政策,以减轻中青年群体的养育压力。通过推进一老一小的政策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国家的养老抚幼福利责任。

① 闫金山:《济贫态度的阶层差异与变迁——基于CGSS2005/2015的实证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Ursula Dallinger, "Public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What Explain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0, 20(4); John Gelissen, "Popular Support for Institutionalized Solidar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0, 9(4).

② 李俊:《从收入到资产: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变迁——以1991—2013年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在我国发展新阶段，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需要推进高质量的经济发
展，也亟需积极进行福利政策体系建设。本篇研究作为为数不多的针对我国民众福利态度的趋
势研究之一，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福利政策提供了有效依据。但是与很多趋势研究类似，本研
究以描述性为主，在解释方面需要更多证据进行支持，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完善之处。此外，本
研究仅就个体的整体性福利态度进行分析，未来可就民众在具体福利领域的态度与需求进行更
细致、深入地研究，为福利政策发展与完善提供更具体与精准的政策建议。

Changing Trends in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in China (2001– 2018):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Age–Period–Cohort Model

Wu Yul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from World Values Survey China samples of 2001, 2007, 2012 and 2018, we use HAPC-CCREM Models to assess age, cohort and period effects on the welfar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welfar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 improved slightly. The age and cohort effe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which means that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re more inclined to the state-run welfare system, especially the 1950s cohort and the 1985 birth cohort have the highest expectations for the state-run system. Moreover, at the macro level,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welfare attitudes fail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al protection hypothesis, wherea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upport the self-interest hypothe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should be more proactive in building policy systems in the fields of elderly care, childcare and employment, gradually reduce unnecessary concerns about welfare dependence, and actively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welfare attitudes; changing trends; age-period-cohort model

(责任编辑: 郭林)